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都市里的农家女

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澳〕杰·华著

吴小英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周文彬总策划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都市里的农家女

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澳」杰华著

吴小英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里的农家女/(澳)杰华著;吴小英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

(中国海外研究丛书)

ISBN 7-214-04125-1

I. 都... II. ①杰... ②吴... III. ①农村—女性—劳动就业—研究—北京市②农村—女性—社会生活—研究—北京市 IV. D66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688 号

书 名	都市里的农家女
著 者	[澳] 杰 华
译 者	吴小英
责任编辑	戴同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25-1/D·629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致 谢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北京和杭州的许多打工妹多年以来与我分享她们的故事。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从这些故事中学到了多少东西,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它们如何感动我,赋予我灵感,有时又如何扰乱我的心绪,但是我希望通过下列著述传达出对我的对话者深深的敬意。我也真诚地感谢谢丽华、李涛、李真、宁东、周玲和王老师(为保护当事人身份,后三个名字是假名),她们慷慨地为我的田野调查提供了建议和帮助。

另一些人为我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与我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研究发现,他们是:塞利·萨尔吉森(Sally Sargeson)、萨拉·彼达尔夫(Sarah Biddulph)、萨拉·库克(Sarah Cooke)、尤思科·彼得科维克(Josko Petkovic)、伯格·贝肯(Borge Bakken)、雷切尔·莫菲(Rachel Murphy)、路易吉·唐巴(Luigi Tomba)、陈佩华(Anita Chan)、潘毅(Pun Ngai)、严海蓉、阿里安娜·盖塔诺(Arianne Gaetano)、爱丽斯·古德斯坦(Alice Goldstein)、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 Roberts)、郑真真、格雷米·巴尔梅(Geremie Barme)、琼·安格(Jon Unger)和安迪·齐布尼斯(Andy Kipnis)。我对他们所有人充满了感激,特别要感谢雷切尔·莫菲、潘毅和安迪·齐布尼斯对我原稿的评论。

我还想感谢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的同事在艰难的岁月里给予我的鼓励和友好支持,他们是:卡洛尔·瓦伦(Carol Warren)、吉姆·瓦伦(Jim Warren)、桑德拉·威尔森(Sandra Wilson)、安妮·玛丽·迈德卡尔夫(Anne Marie Medcalf)、塞利·萨尔吉森、梯姆·莱特(Tim Wright)和卡洛林·布卢尔(Carolyn Brewer)。我还要

2 都市里的农家女

热忱地感谢马格丽特·卓利(Margaret Jolly)、约蒂·帕威(Jodi Parvey)、安尼格雷特·申博格(Annegret Schemberg)、理查德·伊夫斯(Richard Eves)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性别关系研究中心的其他成员,他们提供了研究和写作的一种真正奇妙的环境。

万分感谢杰米·格瑞邦姆(Jamie Greenbaum)优秀的研究助理和翻译工作,感谢阿里安娜·盖塔诺对北京“打工妹之家”实施问卷调查的帮助,感谢陈家忠帮助绘制图表。我也诚挚地感谢安尼格雷特·申博格和丽亚·范德·赞特(Ria Van De Zandt)对排版的无价帮助,感谢 M. E. 夏普(Sharpe)出版公司的帕特利夏·鲁(Partricia Loo)、马吉可·帕尔森(Makiko Parson)和安吉拉·皮里奥拉斯(Angela Pilouras)在制作本书过程中的高效率。

感谢莫多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为1995、2001和2002年我在中国的田野调查提供资助,感谢北京大学在2001年为我和我的儿子提供半年的访问机会。

最后,我深深地感谢我的伴侣尼克·查普曼(Nick Chapman),感谢他的爱、支持和杰出的编辑工作;感谢我的母亲爱莉诺·杰卡(Eleanor Jacka)和我的外婆伊迪丝·迪斯基(Edith Dissky),她们最先教会我故事的重要性;感谢我的儿子米莎·彼得科维克(Misha Petkovic)与我共享生活的乐趣并使一切变得有意义。

本书某些部分的早期版本已经在别处出版。我很感激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允许重版《人在旅途:女性与当代中国的城乡流动》(*On the Move: Women and Rural—to 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Arianne Gaetano & Tamara Jacka, 2004)一书导言的摘录,这一部分内容出现在本书的导论和第一章中。我也感谢《亚洲批判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允许重版《寻找出路:北京打工妹中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协商》(*Finding a Place: Negotiations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mong Rural Women in Beijing*,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 37, no. 1, 2005, pp51—74)一文修订和扩展后的版本。

目 录

致谢 / 1

导论:从“边缘”到“中心” / 1

第一部分 主体

第一章 在“农村的愚昧”与“城市的现代性”之间 / 31

第二章 打工妹的主体建构 / 60

第二部分 地方

第三章 在位与错位 / 89

第四章 向往之地 / 121

第三部分 人

第五章 关系 / 165

第六章 认同 / 208

第四部分 时间

第七章 叙述、时间和能动性 / 249

附录 书中提到的对话者名录 / 284

注释 / 286

参考文献 / 304

导论：从“边缘”到“中心”



图1 走进北京海淀区民工聚居地

2001年8月，北京

梁春和她的家人住在海淀区一个农民工聚居地，从北京城区往西北方向乘公交车一个半小时的地方，远离灯火辉煌的现代购物大厦和高耸的写字楼。从主路的公共汽车站出发，我和我的儿子沿着一条土路步行了20分钟。右边是大片的蔬菜地和果树，左边是新近用推土机推平的一块空地，上面是各色各样混乱的摊位和各种修理间，标志着这一聚居地的边界。15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時候，我们班曾经旅行到这个区域，去参观一个模范村。如今，整个海淀区都被看成是市郊中心了。附近的农村居民不再种地，而是将房子出租给从全国各地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此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

这条土路越来越窄,最后通向一条泥泞的小径,下雨之后几乎无法通行。左侧有一长排低矮、将就的土砖房,是那种只有一层的平房,特意盖了租给农民工住的。梁春和她的家人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他们来自安徽一个贫穷的村庄,到这儿已经7年了。梁春自己在家做点缝纫活,她的丈夫是一个自雇的建筑工和室内装修工,他们的两个孩子在附近的一个民工子弟学校上学。这个家租的房子大约13平米,地面是泥土的。就在门边有一个长长的支架,上面放着一个过时的旧缝纫机,一大堆布料整齐地叠放在一边。在它旁边是一个小架子以及一个用来做饭的煤气罐。在房间的中心,一个灯泡悬挂在一张小小的圆形折叠桌上方,两张折叠椅是为接待我们来访准备的。房间的后部是一个双人高低床,全家人睡在下铺,他们的东西就堆放在上铺。天气好的时候,梁春在屋外做饭和洗衣服,门口有一个与邻居共用的水龙头。沿着巷子往前走有一个公共厕所,里面污秽不堪、臭气难闻,外边堆满了垃圾。住在这儿的民工虽然付了“卫生费”,但是公厕很少被打扫,垃圾也很少有人清理。梁春告诉我说,这儿的卫生条件比在村里差多了。

这是梁春第一次见到我的儿子,她热情地向他问候,尽管在这种热烈的欢迎背后,我能感觉到她的焦虑。她解释说,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国际大学生运动会将在海淀召开,因此当地政府一直试图让农民工尽量地少引人注目。在我上次采访后的这一个星期里,这一居住区边缘又有更多房子被推土机推平了,还有谣传说,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整个聚居地都会被夷为平地。另外,在过去的这一周里,每天晚上都有公安局的人——也就是警察来这儿搜查,把抓到的民工用载货卡车运到北京市北面的昌平拘留所。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有个完。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妇女的书,描写20世纪末21世纪初那些离开家乡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加入到被认为是和平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国内迁移浪潮的中国女性的故事。本书主要以对生活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农村女性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同时对这些妇女在城市的生活经历和故事进行分析。

在过去的20年中,从农村到城市流动的大规模增加,已经成为中

国政府为发展市场经济并“与世界接轨”所做的努力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无论对于农村的打工者还是民工流入所在地的都市人来说,这种流动都被视为是从“贫穷”、“落后”和现代化的“边缘”进入到“富裕”、“文明”和现代化“中心”的一场运动。

从农村流动到都市的大部分人是暂时的或“非官方的”迁移者,属于所谓“流动人口”。目前这一群体包括大约 8000 万到 1.2 亿人口,构成了大部分大城市人口总体的 $1/5$ 到 $1/3$ ^①。所谓“非官方移民”和“流动人口”是指任何没有经过正式的户口迁移手续而直接从家乡暂时或长期流动出来的人^②。根据中国 1950 年代实施的户口登记制度,所有公民根据居住所在地不同进行了划分,分别被归属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户口通常从母亲那儿继承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户口从农业转到非农,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甚至从小城镇转移到大都市,都是极其困难的。

1980 年代以前,户口登记制度和毛泽东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的其他方面相结合,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永久不平等,与此同时也阻碍了农村人向更加繁荣的城市迁移的可能性。特别是,面对如何让一个主要依靠农耕而资本稀缺的经济发展起来并走向现代化的两难问题,毛泽东政府采纳了前苏联的以农哺工的策略,通过抽取农业资源来支持重工业部门。同时,给城市居民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终身就业和福利等等,但农村户口的居民则与此无缘(Chan and Zhang 1999, 821)。这样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被有效地遏止了,因为在城市如果没有当地的非农户口,要买到粮食或找到住房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随着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出现,户口在限制农村人向城市迁移方面的效力大大地消减了。由于不再依赖于政府对食品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被官方登记为农村、农业户口的人,现在可以在城镇一住几个月甚至几年。同时,经济改革既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走出村庄,也促使城镇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长。

这些经济改革启动于 70 年代末,伴随着人民公社体系的解体和对家庭承包制的回归,以及促进农业生产的多样化、专业化和商业化的努力。最初这些新的措施成功地刺激了农业生产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反过来又为农村工业的扩张和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资本和

劳动力来源。虽然不同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加大,但是这些还可以由农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整体快速提高以及城乡收入鸿沟的逐渐缩小而得到弥补。

然而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农村的实际收入开始停滞不前,而农村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均等也日益扩大。可耕种面积的短缺,本地就业机会的不足,农产品价格的跌落和税收的增加,更有地方干部肆无忌惮的腐败,所有这些迫使农民走出他们的村庄。由于电视的影响和跨地区交往的增加,人们想走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愿望如今变得更加清晰,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愿望,加上一些人希望逃避压迫或者家庭冲突的需要,进一步驱使农村人走向城镇。

与此同时,由政府放松管制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市场所导致的城市经济的膨胀,造成了城市对无特殊技能的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这些新工作多半是短期的,不提供社会保障,也无福利可言,是低地位、重体力、工作环境恶劣的差事。毫无疑问,它们大部分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其结果是对农民工的需求飞速增长,因为他们接受这些恶劣的条件,并且雇用价格更加便宜。

从 1977 到 1984 年间,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的平均数大约是 23.1 万。到 1994 年这个数字已经跃居 330 万(Poston and Duan 1999, 27)。90 年代中期,北京市政府开始想办法减少流动人口,1997 年宣布要将流动人口控制在 180 万的目标(同上, 11)。在 1997 年 11 月进行的北京市流动人口普查中,实际统计出的流动人口数大约为 230 万(谭深等 2002, 200)。到 2001 年又增加到 330 万,大约占全市总人口的 23%(北京市统计局 2002, 72 和 577)^③。这个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农业户口,其中 37% 以上是妇女,这些妇女当中 72% 是 15 到 35 岁的年轻女性(北京市统计局 2002, 579)。在 6 岁以上的女性流动人口中,大约 4% 是文盲,17% 上过小学,52% 上完了初中,17% 完成了高中学业,还有 10% 上过高等技术学校。大部分女性打工者或者已经生活在城市 6—12 个月(26%),或者已经 1—3 年(34%)(北京市统计局 2002, 579)。

这些“流动者”一直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线,许多男性打工者是建筑工人,而女性打工者通常是低工资的女招待、小商贩、保姆、保洁员和妓女,或者是在条件恶劣的跨国公司和血汗工厂里劳作的女工,

为全球市场生产服装、玩具和电子产品^④。与其他国家的外国劳工相类似,这些农民工在城里是二等公民。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当地政府、雇主和其他人一般都歧视那些没有本地城市户口的人,将农民工的就业限制在低薪和卑微的狭窄工种里,并且不给他们提供当地城市职工所享有的保障和福利,农民工子女在当地学校上学必须缴纳昂贵的费用,民工还常常遭遇捣毁居住点、被拘留或者被遣返农村的运动。

根据我们所知的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移民的研究,我们可以猜想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中国农民工的经历会给他们在世界观、认同感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方面带来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依次转化为更加广泛的社会变迁形式,而这将构成中国未来几年中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特殊意义和后果的核心部分。

专门研究女性流动人口的特殊经历对于从多方面理解中国的全球化、流动和社会变迁之间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首先,尽管在大多数城市中她们只构成流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⑤,但是女性打工者在一些经济部门占主导地位,包括家政服务、卖淫、卫生保洁、纺织、玩具、电子行业等。此外,从全国范围看,流动人口中农村女性的比例正在不断增长^⑥。

其次,中国农村的性别关系和女性的遭遇是妇女向外流动的重要原因,它们也是最有可能受到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影响的社会关系领域之一。例如一些学者曾经推测,外出打工可能为农村妇女提供了一条逃脱性别压迫和暴力的重要途径,甚至可能有助于降低农村妇女的自杀率(Lee, and Kleinman 2000, 224 and 234; Bossen 2002, 358)。另一方面,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女性打工者中在城市短期逗留之后重新回到农村的,她们罹患精神疾病和自杀的比率更高(Murphy 2004, 265; Kearney, and Miller 1987; Hichling 1991, 80—89)。这些发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中国的自杀率是全球平均自杀率的3倍,并且与世界上别的国家不同,中国的自杀者中农村年轻女性占大多数(Lee, and Kleinman 2000, 224 and 234)。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类似,中国农村妇女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可能体验到了一种独立于她们的父母、配偶以及其他权威形式的自主和解放感,并获得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毫无疑问,这看来是促使农村女性向城市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农村女性除了和

男性农民工一样常常遭遇剥削和歧视之外,还要受到性剥削、性别歧视和性虐待。除此之外,中国的城乡差别,城乡之间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尤其是那些与性别和性关系相关的方面的差异,以及其他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因素等,都可能使得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或从城市回到农村)以后非常难以适应。对大多数人来说,另一个相伴的事实是,流动通常发生在他们从青年向成年转变的过渡时期。最后,农村女性的流动可能会给她们个人、家庭和社区造成特殊的困难,因为它与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期望相冲突。按照这种期望,女孩通常在20刚出头就该嫁人了,她们应该住在丈夫所在的村庄,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包括带孩子、做家务、干农活。

本书旨在加深对农村女性在北京的流动和生活体验的理解^⑦。本书的素材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方面包括对“打工妹之家”成员的访谈、参与观察和其他研究形式。“打工妹之家”成立于1996年,组织者宣称这是中国为农村打工者建立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并且至今还是屈指可数的这类组织中的一个^⑧。它是由中国为农村妇女创办的惟一个国家级刊物《农家女》(月刊)编辑部建立的。今天这个打工妹俱乐部已经吸收了400多个会员,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的农村女性。俱乐部的目标是提供给打工妹一个聚会并分享经验、社交、参与讨论和上课的场所。2002年以来,俱乐部还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打工妹》,并建立了一条打工者热线和一个打工者维权小组。

1999年我与《农家女》杂志和“打工妹之家”合作,举办了一个以“我的打工生涯”为主题的全国性的征文比赛^⑨。本书的分析取材于这次比赛中征集到的部分故事以及发表在《农家女》和《打工妹》上的一些文章。2001年我对“打工妹之家”的100个成员做了问卷调查^⑩。问卷包括69个问题,范围包括流动的原因、逗留在北京的时间、在北京的职业和居住状况,以及认同感和对未来的愿望等主题。有关这次调查的发现贯穿本书。

在2001和2002年间,我花了7个月的时间呆在北京,经常参加“打工妹之家”的活动,对俱乐部成员进行访谈和非正式的交流。我总共花了大约55个小时,对俱乐部的22个女性成员进行了正式的录音访谈,还花了几个小时与俱乐部的几个男性成员以及《农家女》杂志的全体成员进行了访谈。我访谈的这22个女性成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农

村,年龄从16岁到38岁,大部分人是保姆、保洁员和工厂女工。其中3人已婚并有一个孩子,其余是未婚并没有孩子的。当时有两个已婚妇女没有工作,一个打工妹来北京只有几个月,但其他的在北京生活至少已经一年,大部分人是在90年代中后期来到这个城市的,其中4人已经在北京生活了8年或更久。

“打工妹之家”的成员和那些为《农家女》写故事的打工妹以“外来妹”为人熟知,意思是“从外地来的年轻女性”,或者被称为“打工妹”,意思是“打工的姐妹”或“打工的女孩”。按照定义,打工妹应该是在薪资部门就业,打工就是指为其他人工作,而不是自雇。尽管不是全部,大多数打工妹都是年轻的单身女性,“妹”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称呼,意思是年轻姐妹或女孩^①。遍及全国的打工妹的主体都是年轻的、单身的薪资工人,在城市的话语和媒体当中打工妹已经成为一种简化了的笼统概念,掩盖了流动农村女性的其他形象。现在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农村妇女生活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她们比典型的打工妹更年长一些,她们是已婚并有孩子的,她们或者自雇或者在丈夫出去挣钱时负责照看孩子。梁春和大部分住在海淀民工聚居地的其他妇女就属于这个类型。还没有专门描述这些妇女的独立词汇,她们只是被当成流动人口或者外来人口的一部分。我在本书中研究的第二个来源就是2001年与梁春和她的邻居们的对话与访谈。在2001年住在北京的那6个月当中,我访问了这个海淀民工聚居地,每周一到两次。除了无数次非正式的交谈以外,我对这儿的15位妇女分别做了长达两小时的访谈,还有一次与一群大约20个妇女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与我交谈的这些女性大多三十几岁,已婚并有一个或大多两个孩子。她们大多数人没有工作,或者与她们的丈夫一起卖菜。她们主要来自河南、湖北和河北这些省份,大部分人从90年代中后期就来到这里,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许多年。

为了达到比较的目的,本书还采用了1989年对北京的10个保姆的访谈资料,以及1995年对杭州的40个打工妹的访谈资料,这些打工妹中有丝绸厂和纺织厂的女工,有售货员,也有保姆^②。本书访谈的所有女性都属于汉族^③。

通过对北京外来女性在访谈和谈话中告诉我的故事,其他打工妹的口头和书面的描述,以及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进行比较,我试图理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对这些女性所产生的物质上和情感上的

影响。我还试图评价向城市流动如何改变了农村女性的认同、身份、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感和在社会中的位置。我将考察流动如何被纳入女性的生活轨迹,以及对她们的时间感、尤其是她们对未来的愿望和关于未来的观点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我试图理解外来女性的经验和故事是以何种方式受到主流话语以及她们各自应对主流话语的不同方式的影响。

经 验

在我之前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专门研究过“经验”。经验在这里被定义为人与世界的接触(engagement),包括有关世界的理解、解释、思想、情感和行动^④。例如,作为“经验人类学家”领军人物的爱德华·布鲁诺(Edward Bruner)写道:“首先到来的是经验。经验人类学关注个体实际上是如何体验他们的文化的,就是说,事件是如何被他们的意识所收录的……经验人类学将人看成是历史进程中建构自己世界的积极的行动者”(Bruner 1986, 4 and 12)。人类学家传统上一直关注个人的经验,运用长期的参与观察作为接近其他人的内在思想的一种方式。然而如布鲁诺所言,在解释与再现他们用于发表的田野材料的过程中,许多人类学家滤去了经验,转而强调结构或文化,或者只是收录一些个人叙述的片断或者田野笔记的摘录,以使文本变得生动活泼。与此相反,经验人类学将人们对于自身体验的表达作为分析的主要重点,而不管这些体验是以个人叙述的方式还是戏剧或狂欢的方式表达出来。布鲁诺认为,这种方法的长处在于“基本的分析单位是由我们研究的人而不是作为外来观察者的人类学家建立起来的。通过将重点集中在这些……表达,我们将研究单位的定义问题留给了所要研究的人,而不是将来自我们自身不断变化的理论框架的范畴强加在他们头上”(Bruner 1986, 9)。

对于关注边缘群体境况的许多女性主义者和其他社会历史学家来说,重视经验是极其重要的^⑤。与经验人类学家一样,他们的部分动机是希望通过研究对象自身的理解而不是通过外部观察者的理解来把握现实。他们同时也希望把先前被忽略的那些群体的生活和故事“记录下来”,这既是因为这些故事本身是迷人的,也是因为它们可以对主流

的历史叙述起重要的补正作用。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试图把那些在中国被明显边缘化的群体的生活和故事“记录下来”。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关注的不仅仅是从“边缘”农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同时也是将流动农村女性的经验和声音从社会和学术关注的边缘带到中心的一种尝试。除此之外,我还对这些外来女性经验的主观感受方面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因为这反映了她们给自己的遭遇和她们的所作所为所赋予的意义。对于经验的这种主观感受方面的重视在分析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由外部观察者认定是反抗而行为者本身并不这么认为的行为,显然不同于行为者自身明确认定是反抗的行为。这种不同对于理解权力关系以及社会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更基本的层面上,我的研究努力追求一种既不是陌如路人也不是不分彼此的理解和沟通方式。这种理解和沟通方式包括与人们在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建立起联系——一起分享快乐和成功的时刻以及不幸、迷茫和痛苦的时光。同时我们也都有一种自我意识(无论这种自我是以什么方式被定义的),试图拥有那种被他人认可和欣赏的自我,努力争取一种自我持续感(Moore, Henrietta 1994, 30)。另一方面,对他人的理解也依赖于了解和尊重不仅仅每一种文化,而且包括每一个人接触世界的独特方式,依赖于理解我们每个人都以我上面描述的特殊方式体验世界,而这些特殊方式中没有一种是相同的(Abu-Lughod 1991, 157—158)。重视他人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扩大了我们所有人在共同生活时对不同模式的选择范围。引用克里夫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话说,“正是我们与他人之间在信仰或感觉方面的不对称,使得我们有可能找到在这个世界上位置,找到在这个位置上的感觉,并且找出我们想要向何处去或不想向何处去的定位。模糊这些差异和不对称……就是切断了我们与这样的知识的联系,也彻底地消除了改变我们的思想的可能性”(Geertz 2000, 78)。然而,我以上所概括的对经验的研究方法,其分析力还存在着潜在的严重局限性。我们将看到这些局限源于对主体、经验、话语和沟通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充分的解释。

经验、主体与话语

在对经验研究所作的最近一次批评中,历史学家琼·司各特(Joan Scott)指出:

当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时,主体(指产生经验的个人或者复述经验的历史学家)的个人视角成为构成解释的证据基础,而关于经验是如何构成的、主体的独特性最初是如何定义的、个人的视角是如何形成的语言(或话语)和历史等问题,则被放在了一边。……让一个不同群体的经验显性化,表明了压抑机制的存在,但并不能揭示这些机制的内在运作方式或逻辑。我们知道这种差异的存在,但却无法按其结构上的关系去理解它。因此我们需要关注通过话语决定主体位置并产生他们的经验的历史进程。并非个体产生了经验,而是经验塑造了主体。根据这个定义,经验就不是我们解释的来源……而是我们试图解释的东西。(Scott, Joan 1992, 25—26)

司各特所要求的“关注通过话语决定主体位置并产生他们的经验的历史进程”意味着什么?这样一种方法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流动农村女性的经验?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种人类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也受到社会实践的影响。通过社会实践特别是通过话语,我们学会按不同的身份种类,或者我们称之为“主体位置”的东西,诸如“农民”、“打工妹”等等行事。依据福柯的说法,我将话语理解为包括知识体以及让知识体得以产生和传播的语言、结构和实践(McHoul, and Grace 1993, 31—56)。话语为谁、可以怎样想象、言说、实践甚至感觉什么制定了条件和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它体现了权力关系。这些规则依历史条件而变化,依不同社会以及同一社会或文化内部的不同话语而变化。

两套话语体系在形成本书研究对象经验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它们是那些涉及中国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分割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并在与“男子气”和“女人味”、“城里人”和

“农村人”等有关的语言和知识中得到了体现和延续,这些术语在当代中国都有特定的历史。权力关系也体现在社会政治实践和结构中,并通过这些实践和结构得到进一步加固,其中包括农村地区同村不通婚以及婚后随男方居住的习俗和户口登记制度。对“农村妇女”和“流动农村女性”的角色的理解与农村婚姻习俗和户口登记制度的延续是相辅相成的。这两种制度和实践都源于男人/女人、城里人/农村人之间的等级区分,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区分。

围绕这些等级分层,人们可以依据其实现的难易程度和吸引力的大小去想象和实践不同的主体位置。例如,一个被贴上了农民标签的妇女,可以拒绝这种定位,转而去寻求城里人的身份,但在目前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它会对这个妇女物质和情感方面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冲击。同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在某些情境下,拒绝所谓男人/女人、城里人/农村人的分类也是可能的,但是结果通常会导致一个人脱离被社会认可的主体的范围。如在中国,成为一个“黑户口”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某人没有登记户口,因此不能划分为农村人或城里人。然而这样做是非法的,它使某人不仅仅脱离了国家规制的范围,也使他失去了合法获得住房、就业、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物品供应的资格。这是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引用朱丽娅·克里斯迪瓦(Julia Kristeva)的说法称之为“可怜的人”的位置:一个不被社会认可的位置。这既是“农村”和“城市”主体的话语生产(discursive production)所产生的幽灵,而这一幽灵又反过来对城乡主体的话语生产具有关键作用(Butler 1993, 3)。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详细考察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话语——尤其是那些涉及性别和城乡差异的话语以怎样的方式产生了特定的主体位置,这些话语又如何阻止、排斥或压制了其他话语的产生。我还试图指出这些话语及其所界定的主体位置范围是如何变化的,未来又会有什么走向。

但是这些话语及其所产生的主体位置与人及他们的认同、能动性(agency)和经验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认同不是一种固定的特性,相反,它们在相互重叠和冲突的不同主体位置之间不断变化。例如,我在北京时,我主要的身份有时是一个具有一定地位和权力的“外国专家”和人类学研究者,有时是一个对中文和什么是中国文化掌握得不太